立足新要求、把握新趋势，

率先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赵磊 张亚兰 刘潇雨[1]

（上海市经济信息中心 200050）

【摘 要】：“基本形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当前，国内外环境正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开放发展面临新形势。本文立足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任务，分析了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新要求。基于上海情况，从功能、内容、路径、内涵、环境等方面，阐述了进一步转型提升的新趋势。围绕上海“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的发展定位，提出了做好“四个统筹”，率先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新发展格局 高水平开放 开放型经济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新发展阶段、新历史任务、新环境条件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上海作为全国开放的前沿阵地，需要更好立足新要求，牢牢把握新趋势，率先构建起新时代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持续发挥引领与表率作用。

一、立足新要求，开放型经济发展要突出“三个强化”

近年来，国际政治和经济局势正呈现前所未有的复杂格局，全球开放合作也在不断调整变化。开放型经济发展，需要立足新形势新变化，进一步强化市场互补、规则衔接和循环能力，不断增强竞争合作和可持续发展新优势。

（一）立足内需为主、外需赋能，强化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畅通性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主动、深入融入国际大循环，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形成了全球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货物贸易规模占全球的比重已经达到 13.5%,[12]货物与服务贸易总额跃居全球第一。

近年来,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内需和外需的市场功能也在相应转变。国际来看,全球经贸活动有所弱化。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遭遇逆流，叠加新冠疫情等外部因素，部分国家和地区经济内向化发展趋势增强，全球货物和服务出口占 GDP 的比重上升势头出现放缓（见图 1）。

国内来看，强大内需市场快速建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以下简称“社零”）与出口总额（以下简称“出口”）走势于 2008

[1]**作者简介**：赵磊，高级经济师，上海市经济信息中心经济预测中心主任。张亚兰，高级经济师，上海市经济信息中心经济预测中心副主任。刘潇雨，上海市经济信息中心经济预测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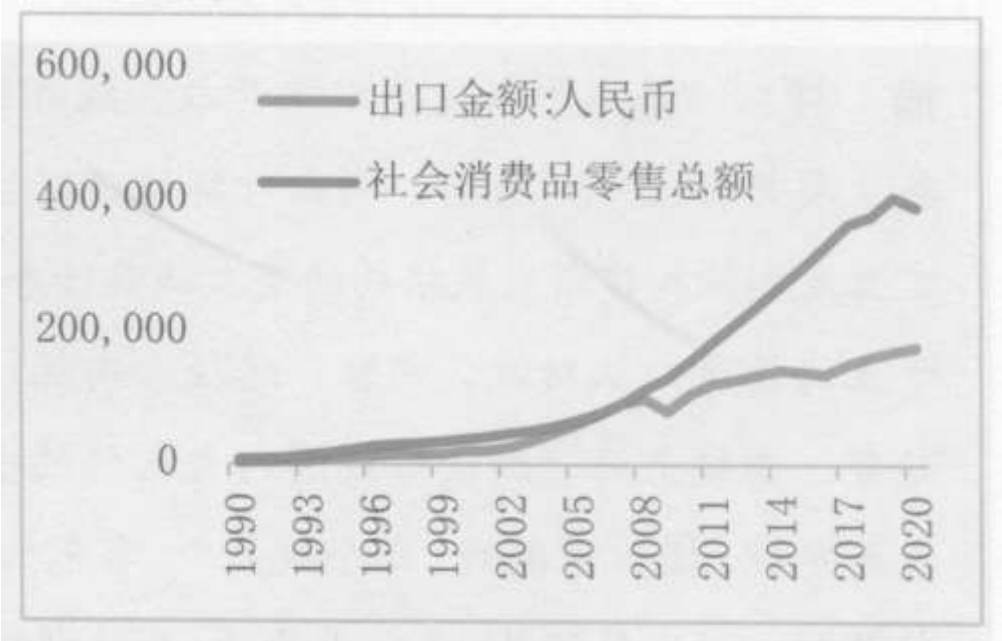
[2]1 根据 WTO 数据，2021 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 6.05 万亿美元，全球货物进出口总额 44.81 万亿美元,中国货物贸易占全球的比重为 13.5%。

年开始出现明显分化，2011-2020 年的十年间，社零年均增速比出口高 4.3 个百分点（见图 2）。

总的来看，进入新发展阶段，全球贸易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已发生改变，对国内而言，内需为主的发展环境日趋成熟，外需作用更多由“拉动”向“赋能”转变。同时，面对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需要更加强调和巩固两个市场的联通效率，不断提升内需与外需的互促循环水平。

来源：世界银行

图 1 全球出口额占 GDP 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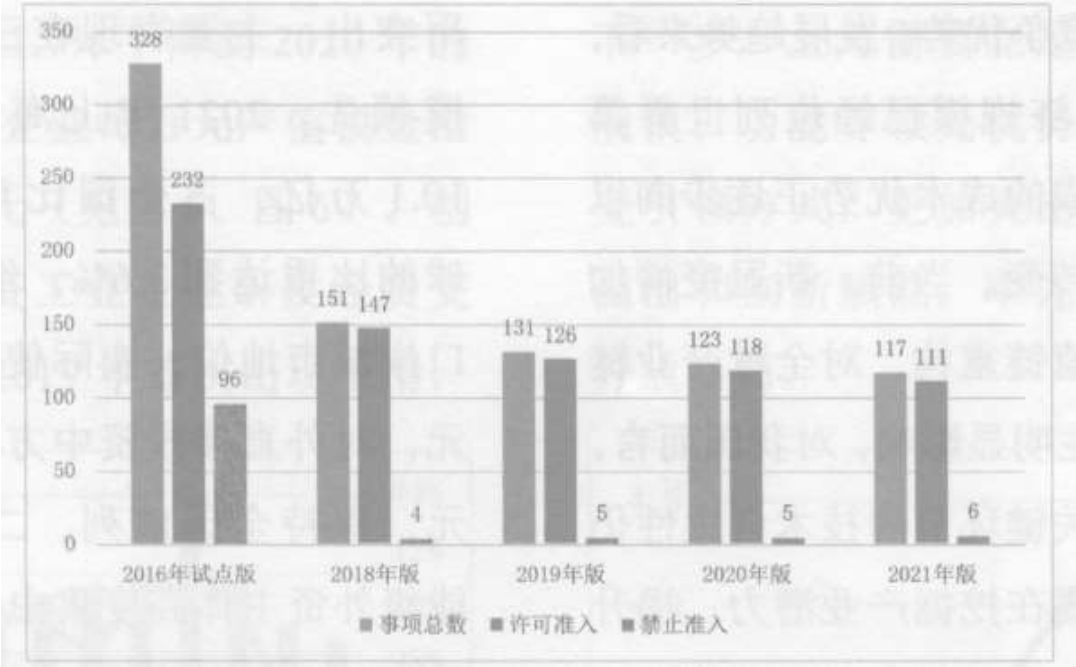


来源：海关总署、国家统计局

图 2 我国出口与社零走势（单位：亿元）

（二）立足功能提升、法制优先，强化公平竞争制度规则衔接性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积极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不断深化改革，逐步建立起与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相衔接的国内经济管理体制。开放准入方面，限制事项逐年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由 328 项缩减为 117 项，其中禁止准入事项由 96 项大幅缩减至 6 项（如图 3）。OECD 国家 FDI 限制指数显示，我国 FDI 限制指数已由 2010 年的 0.436 逐年下降至 2020 年的 0,214。开放平台方面，全方位体系加速构建完善。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已形成以自贸区及新片区、自由贸易港等为高地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在制度开放方面做出系列探索。同时，依托广交会、进博会、服贸会等平台载体，构建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窗口（见表 1）。当前，全球经贸体系加速重构，CPTPP、RCEP 等区域或双边贸易体系与多边贸易体系竞争日趋激烈，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比，我国在服务业开放、电子商务、技术性贸易壁垒等许多方面还存在差异，需要着眼于国际经贸体系和贸易投资规则的调整与衔接，在若干重点领域率先突破，不断提升特殊经济功能区的平台能级。同时，将法规制度摆在更加优先的位置，不断缩小基于竞争主体的条件差异，形成更加国际化、市场化、法制化的公平竞争制度规则。



数据来源：国家发改委官网

图 3 2016 年-2021 年我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数变化情况

表 1 我国主要开放平台功能特点及具体内容

开放平台	功能特点	具体内容

自由贸易试验区	制度创新，产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经验推向全国	在投资自由、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赋税制度、政府管理模式、法制化体系、自然人流动管理等领域开展制度创新，对标国际通行规则，率先推出重大开放举措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	实施具有较强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开放政策和制度，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	打造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通过加快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更好满足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的要求。
海南自由贸易港	打造与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相比肩的开放高地	自由贸易试验区+部分零关税+低综合税负（增量海外业务的低税负、简单税制）+极简负面清单+人员、资金、商品、技术的有条件自由流动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博会）	货物进口/部分服务进口	聚焦货物和部分服务的进口，交易商品和服务，交流文化和理念，是一个国际合作的综合性公共平台。在逆全球化思潮涌动、贸易摩擦和投资保护不断加剧背景下，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发展自由贸易的中国方案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服贸会）	服务业扩大开放	聚焦服务业扩大开放，致力于成为中国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的重要渠道，权威服务贸易政策和信息的发布窗口，各国服务贸易企业的交流合作桥梁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	货物出口	创办初期承载着突破西方经济封锁、为国家出口创汇、支持国家建设的重要使命，进入新发展阶段，广交会创新机制，丰富业态，拓展功能，努力打造成为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促进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平台

（三）立足质量意识、底线思维，强化产业链条循环体系安全性

根据世界银行测算，金融危机以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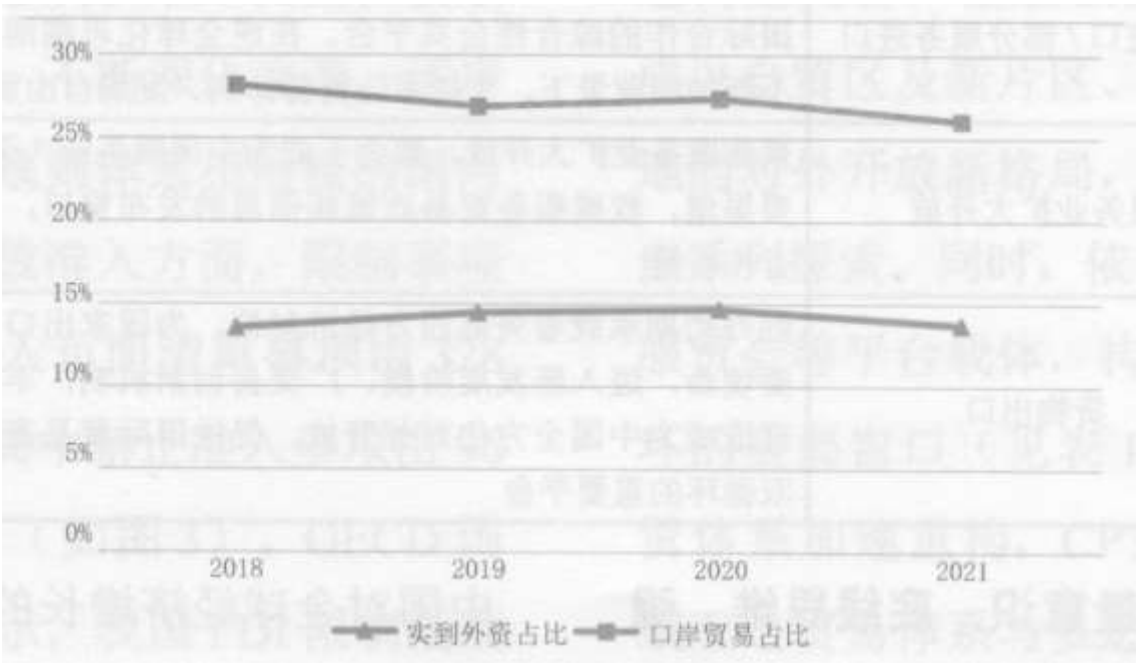
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30%,已经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循环体系，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参与方。发展基础来看，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数据，世界 500 余种主要工业品种中，我国有约 230 种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作为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我国完善的工业体系有效降低了配套生产成本，在国际贸易中形成了强有力的竞争优势。发展趋势来看，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位列世界第二，基于要素形成的成本优势正逐步向以数字等技术优势转变。当前，新冠疫情加速催化了全球价值链重构，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物流链产生明显影响，对我国而言，部分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技术自主性仍有提升空间，需要在挖掘产业潜力、提升质量效益、更高水平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加快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全面树立底线思维、安全意识，把握经济率先恢复的窗口期，积极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二、把握新趋势，上海发展开放型经济要注重“五个加快”

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上海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者，需要立足开放功能、内容、路径、内涵、环境的新变化，加快新转变，实现新突破。

（一）更加注重全局功能的转变，加快实现“领先”到“率先”的延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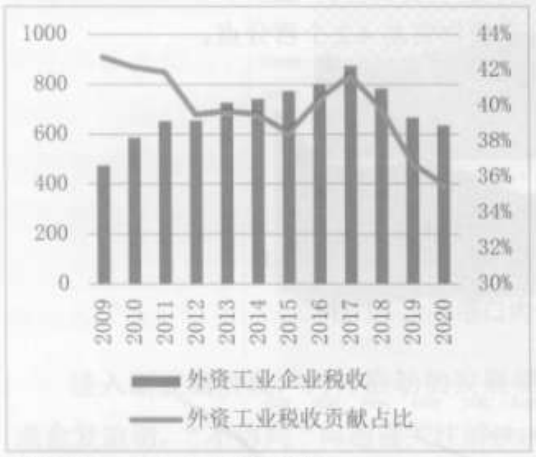
上海历来是全国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开放基础扎实，领先水平和引领作用突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规模领先。2021 年上海口岸贸易额达到 10.1 万亿，占全国比重为 25.8%,占全球的比重达到 3.6%,继续保持全球最大口岸城市地位。实际使用外资 225.5 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中方投资额 196.2 亿美元，保持全国前列。二是主体集聚。高能级外资主体高度集中，截至 2021 年底，已累计认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831 家，外资研发中心 506 家，是外资总部和研发机构最为集聚的城市之一。三是功能引领。2013 年，启动建设全国第一个自贸试验区；2018 年起，作为主办城市，首次并连续四年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博会”）；2019 年，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功能载体建设进入新阶段。



数据来源：上海市统计局、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国家统计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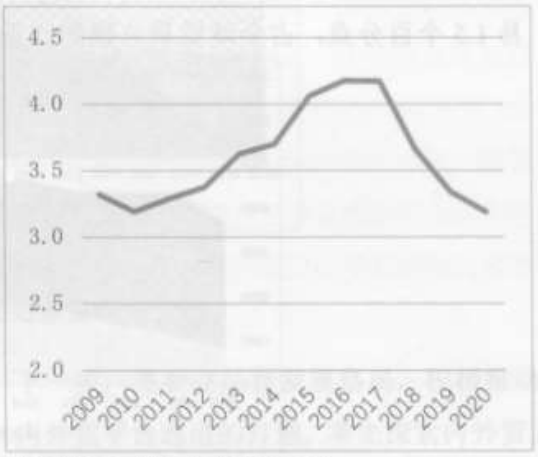
图 4 上海实到外资、口岸贸易占全国的比重情况

进入新发展阶段，上海开放经济发展面临新的变化。质量效益方面，上海外资企业的税收贡献有所减弱，外资工业税收总额由 2017 年的 875.2 亿元下降到 2020 年的 636.38 亿元，占同期全市工业税收的比重由 41.7%下降到 2020 年的 35.6%,外资工业企业每百元产值税金由 4.2 元下降到 3.2 元（见图 5、图 6）。创新投入方面，外资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连续增长后在 2019 年首次出现下滑，占全市工业企业研发支出的比重同比下降 4.4 个百分点（见图 7）,研发人员数量在保持多年稳定之后出现下降，总人数同比下降 20%,占全市工业企业研发人员的比重下降 7.1 个百分点（见图 8）。下一步，上海需要立足全局，在延续好规模、功能等领先优势的同时，主动转变引领方式，更加突出效益升级、效应溢出和创新赋能，率先形成更高质量的开放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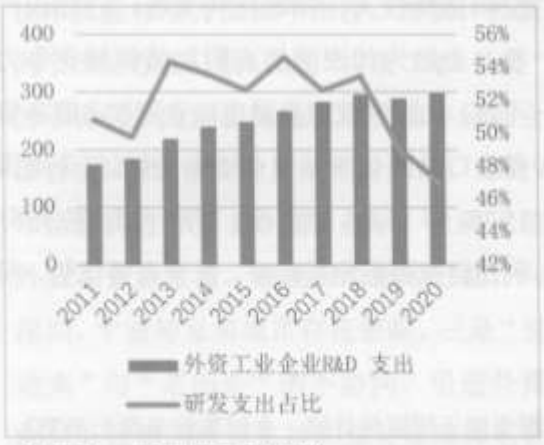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历年上海统计年鉴

图5上海外资工业企业税收及贡献占比情况(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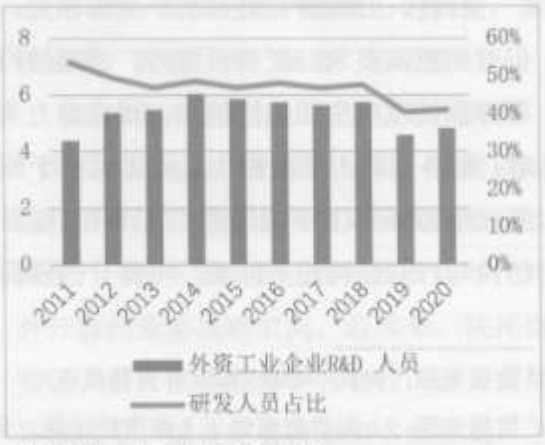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历年上海统计年鉴

图6上海外资工业企业每百元产值税金情况（元）



数据来源：历年上海统计年鉴

图7上海外资工业企业研发支出及占比情况(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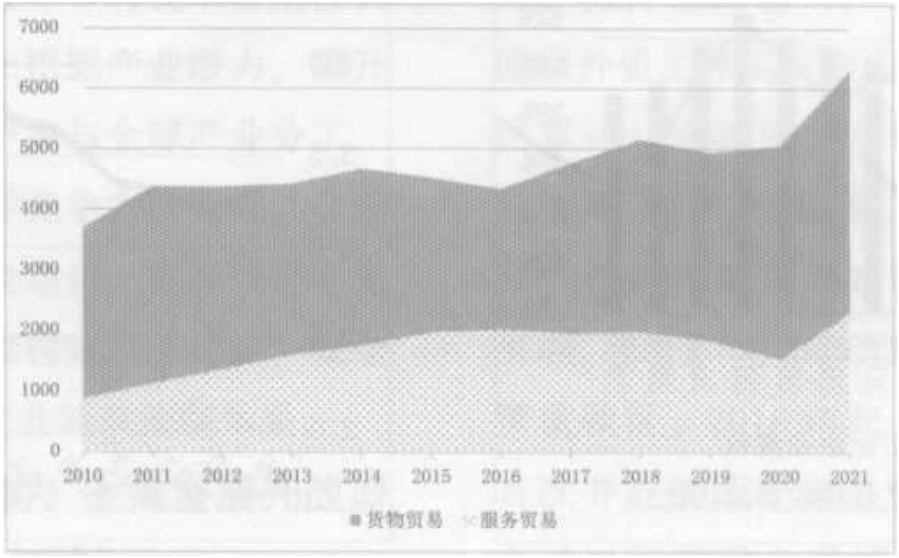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历年上海统计年鉴

图8上海外资工业企业研发人员及占比情况(万人,%)

（二）更加注重内容领域的转变，加快实现“货物”到“服务”的升级

近年来，上海开放领域和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一方面，货物贸易常年保持较高水平。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连续 12 年全球第一，货物进出口总额 2021 年增长 16.5%,达 4.06 万亿。另一方面，服务贸易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全球来看，服务贸易已经超越货物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新增长点，2001 年至 2019 年，全球服务贸易进出口年均增速为 7.9%,高于货物贸易 1.5 个百分点，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已从 2001 年的 19.6%上升到 2018 年的 23.9%,据 WTO 测算,到 2040 年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将提高 50%。[2]上海来看，作为全国服务业最发达的城市，服务贸易呈现较好发展态势，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体量规模大。2021 年服务贸易额占全国的比重已经高达三成。二是结构情况优。2021 年服务贸易占全部贸易的比重为 26.7%,远高于全国的 11.9%,超过全球平均水平。[3]三是增速水平快。2011 年至 2021 年，服务贸易年均增速达 9.2%,高于货物贸易 4.2 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上海市统计局、上海市商务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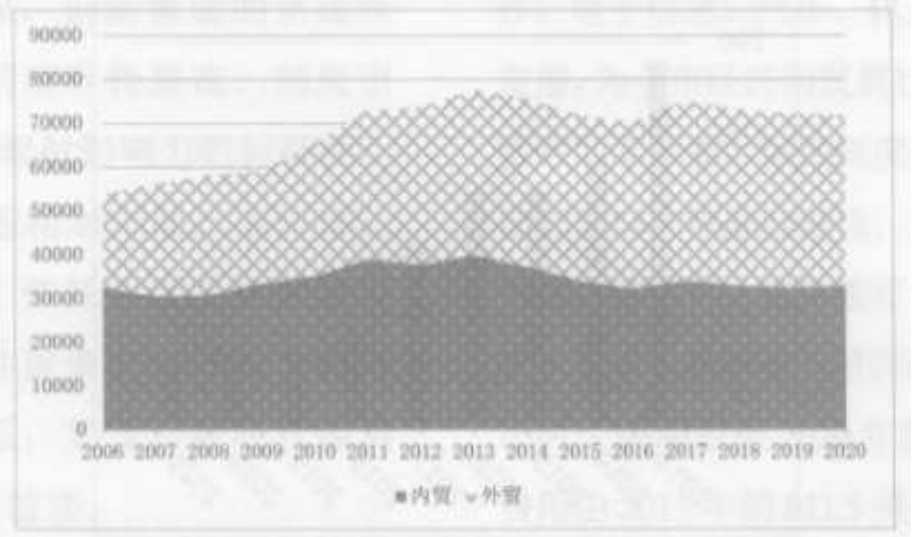
图 9 上海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规模变化情况（亿美元）

目前，上海服务贸易水平全国领先，但对照更高要求，在规模潜力、领域结构等方面的发展空间依然较大。规模潜力来看，服务贸易占贸易的比重还远远小于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73.1%），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还不匹配，可提升的规模空间依然较大。领域结构来看，以知识产权、金融为代表的的高附加值领域竞争力不足，知识产权和金融出口分别仅占服务贸易出口总额 0.78%和 0.33%，远远低于美国 15.3%和 13.4%的水平。[43]下一步，应充分利用自身服务业基础好、水平高等优势，积极拓展全球市场，做大规模、做高质量，实现贸易领域向服务延伸的升级与转变。

（三）更加注重路径模式的转变，加快实现“对内”与“对外”的协同

在大力引进外资和发展出口的背景下，上海外资外贸规模不断发展壮大。出口结构来看，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占全市出口总额的比重长期处于 70%左右的高位，加工贸易的比重在 2008 年以前也一直维持在 55%以上。港口结构来看，入世后本市外贸吞吐量增长明显快于内贸，在 2014 年首次超过内贸后差距持续扩大（2014 年-2017 年），2018 年以来，内、外贸的结构整体保持稳定。

[3]2 数据来源：WTO《2019 年世界贸易报告》
3 数据来源：上海数据来源于上海市统计局，全国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全球数据来源于 WTO，2019 年全球服务贸易占全部贸易的比重为 23.9%，2020 年受疫情影响，该比重下降至 21.1%。
4 数据来源：上海数据来源于上海统计年鉴 2021，美国数据来源于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上海市经济信息中心整理计算。



数据来源：2021 年上海统计年鉴

图 10 上海港口内外贸吞吐量情况（万吨）

进入新发展阶段，内外联动的发展要求愈发迫切，“不协同”问题需关注解决：一是“内贸”与“外贸”的不协同。主要体现为内贸和外贸在监管体制、法律法规、技术质量标准方面的不衔接，内贸、外贸两个市场存在分割。二是“内资”与“外资”的不协同。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常年位居全国首位，但民营企业发展相对薄弱。《2019 年全国民营外贸 500 强》显示，上海民营外贸在企业数量、进出口总额等方面，与深圳、宁波等兄弟城市存在差距。三是“引进来”与“走出去”的不协同。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体系存在差异，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与新加坡、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下一步，需要立足新发展格局，积极推动内外贸平台通道的打通，率先探索内外贸、内外资一体化管理，更加强化企业走出去的引导与服务，实现对内和对外的协同。

（四）更加注重内涵重心的转变，加快实现“要素”向“制度”的切换

2018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明确，“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制度型开放已成为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取向。近年来，依托自贸区、新片区等载体平台建设，借力营商环境改革、综合配套改革等多维推动，上海制度型开放取得积极成效。改革创新方面，深入实施负面清单管理。上海自贸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已由 2013 年的 190 条，缩减到 2021 年的 27 条。临港新片区全面系统集成改革创新成效逐步显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加快落地，分解出的任务已完成 90%（见表 2）。制度推广方面，示范引领效应不断增强。截至 2020 年 9 月，上海自贸区已有 328 项改革举措在全国复制推广。以“证照分离”改革为例，2018 年 9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向全国复制推广上海自贸区“证照分离’’改革，2019 年上海继续探索开展“一业一证”改革试点并于 2020 年 11 月上升为国家级试点事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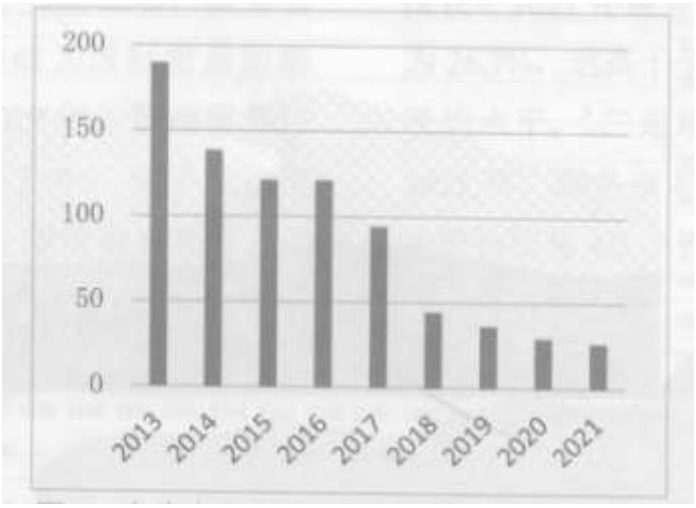


图 11 上海自贸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变化情况

表 2 临港新片区成立以来的制度开放探索[54]

领域	举措
投资自由方面	全国首家外资控股的合资商业理财公司、首家外商独资的金融科技公司落户；在全国率先试点强化竞争政策；率先探索国际化商事纠纷解决方式，启动金融法治试验区建设。
贸易自由方面	设立全国唯一的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构建全新的“六特”海关监管模式，成立离岸贸易监测中心、服务中心和创新发展研究基地，上线离岸贸易与国际金融服务平台。国内首单跨关区国际中转集拼、首单国际铜保税标准仓单质押融资、首单飞机船舶跨境租赁、首单境外仓单离岸转手买卖等创新业务相继落地。
资金自由方面	在全国率先取消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资本金专户，率先开展境内贸易融资资产跨境转让、本外币合一跨境资金池、一次性外债登记、高新技术企业跨境融资便利化额度等试点。
运输自由	出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国际船舶登记管理规定》，目前已完成 10 艘船舶登记注册。完善多式联运和集疏运体系，设立洋山国际中转集拼公共服务中心，建设东北亚空箱交换中心，开展沪浙跨港区跨关区国际航行船舶供油试点，完成全球首次 5G+AI 智能化港区作业，设立全国首个异地缴纳社保的外资船舶管理公司和首个外资船员劳务外派公司。
人员从业自由	率先探索电子口岸签证，推行更加开放便利的外籍人才长期及永久居留政策，放宽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条件限制，开设工作和居留许可“单一窗口”，实行境外专业人才执业备案、开放相关职业资格考试等政策。在上海全市突破实施缩短“居转户”年限并放宽评价标准、管委会直接推荐人才引进重点机构、自主制定技能人才引进目录、人才购房政策定向微调等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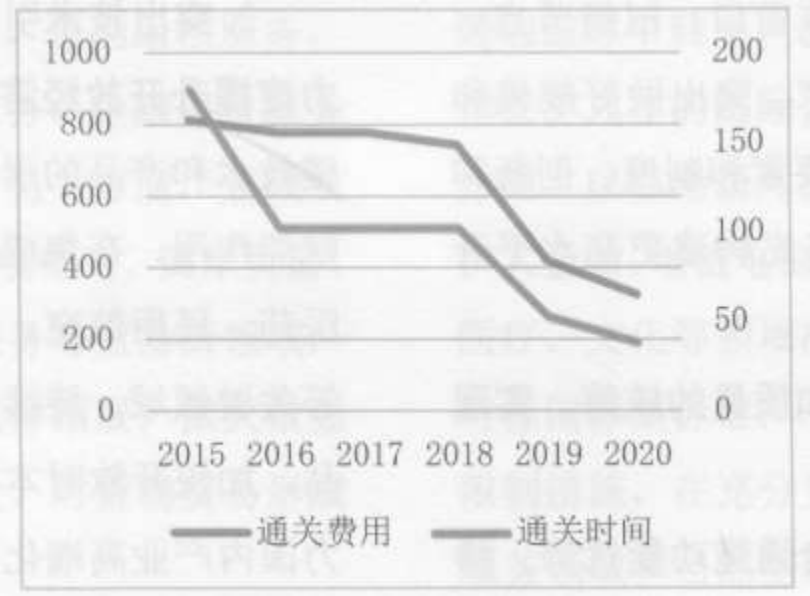
[45] 资料来源：临港新片区两周年成绩单 http://news.hexun.com/2021-08-19/204186347.html

信息快捷联通	率先在智能网联汽车和车联网领域建立数据跨境流动“正面清单+分级分类”管理制度，开展数据跨境流动安全评估试点，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投入使用，试点建设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

长期以来，上海在制度先行方面，始终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为全国的改革深化贡献了大量经验成果，但是对标全球先进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制度高标方面，知识产权、竞争规则、政府采购、劳工保护等领域，与高标准规则还不匹配。制度集成方面，部分改革举措存在碎片化现象，创新集成的系统性和配套政策的协同度有待提高。制度引领方面，具有全球辐射影响力的标杆性、主导性创新供给还相对不足。下一步，要主动革新理念，依托要素开放的良好基础，积极对接并探索主导符合全球开放趋势的制度体系，架设好新时代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制度链接。

（五）更加注重环境局势的转变，加快实现“效率”与“安全”的统筹

强化分工优势、提升管理效能，是全球开放合作的出发点与落脚地。随着开放进程的持续深入，上海获益良多。经济效率来看，依托国际大循环，上海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外资占 GDP 的比重达到四分之一，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日趋均衡。同时，通过中外合作，电子信息、汽车、化工等支柱产业长足发展，为全市经济的发展壮大打下坚实基础。行政效率来看，依托制度改革和“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等平台建设，上海国际经贸服务效率快速提升。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上海通关时间已从 2015 年的 180 小时大幅缩短至 2020 年的 38.9 小时，通关费用由 2015 年的 811.5 美元缩减至 324 美元（见图 12）,跨境贸易指标排名便利化水平大幅提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

图 12 上海通关费用、通关时间变化情况

在管理服务效率快速提升的同时，全球分工体系下诸多风险的快速暴露，亦不容忽视。对上海来讲，防范产业和制度风险与巩固升级开放水平，同样关键。产业风险方面，上海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高端产业发展迅速，集群发展态势加速显

现，但在部分原材料、生产设备、系统软件等关键环节，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进口依赖。制度风险方面，上海正积极开展离岸金融、跨境数据流动、服务业准入等领域的创新试点和先试先行。模式创新的同时，监管能力也面临更高要求，前瞻建立匹配度更高的风险防范和安全监管配套体系已愈发迫切。下一步，要在加快制度创新的同时，更加注重效率与安全的统筹，持续强化风险研判、风险识别和预警防控，有力提升重点领域、特殊领域的风险管理能力，切实筑牢开放运行安全屏障。

三、增创新优势，上海率先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做好“四个统筹”

总的来看，经多年发展，本市开放型经济已取得长足发展，但也面临现实挑战，需要紧紧围绕“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的“一个总目标”，牢牢把握高质量、制度型“两个关键”，着力强化开放窗口、枢纽节点、门户联通“三大功能”，突出做好规模和质量、贸易和投资、要素和制度、创新和安全“四个统筹”，率先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做好规模和质量的统筹，实现“两个提升”

1.发挥多层次平台通道功能优势，持续提升开放规模和能级。一是用好国际进口博览会平台，打造国际贸易进口枢纽。依托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不断放大进博会平台功能，持续扩大海外优质消费品供给，构筑“上海品牌”和国际消费城市新优势。培育本土大型进口企业，支持大型零售企业拓展全球直接采购业务，鼓励跨国公司开展面向中国和亚太市场的集散分拨业务。二是用好自贸区、新片区平台，打造高端实体制造出口门户。以临港新片区、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双特”政策为支撑，以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年再出发为契机，大力发展以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民用航空为代表的高端实体制造业，为上海外贸出口稳定增长打牢基础。三是更好发挥区域一体化节点优势，强化内外贸一体化链接作用。发挥长三角一体化优势，推动区域综合保税区联动发展，支持区内加工贸易企业积极拓展国内市场、打造全球分拨中心。发挥上海开放龙头和制度创新优势，强化贸易规则、标准的内外链接，积极推动内外贸同线同标同质，形成面向两个市场的贸易新格局。

2.突出技术引领、效益升级，以更大力度提升开放经济质效。一是鼓励引导关键技术和产品的引进。强化开放经济产业赋能作用，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民用航空、碳排放、环保检验检测等关键领域，持续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产品，加快开放对本土创新的拉动支撑，助力国内产业高端化发展。二是做大做强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规模。进一步开展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创新，加快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中心，加快金融机构对走出去的支持，扩大金融服务贸易出口。抢抓后疫情时代机遇，充分发挥上海在线文娱优势，支持文化企业出海。培育数字贸易领域全球标杆企业，开发原创精品 IP 和企业品牌。三是推动利用外资由规模速度型向综合效益型转变。引导跨国公司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发挥产业链集成优势，进一步吸引研发、设计、金融、物流、供应链管理、营销、信息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的外商投资。优化跨国公司供应链体系，以更完善的发展生态，推动现有高能级主体延伸投资链条，形成产业链和供应链系统完整、价值链增值延伸的新格局。

（二）做好贸易和投资的统筹，促进“两个平衡”

1.贸易方面，促进货物和服务的平衡。注重通过贸易相关服务业的拓展和贸易新方式的探索，实现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协同发展和相互促进。一方面，依托“一带一路”等开放平台，更好发挥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的拉动作用，带动运输服务、电信服务、信息咨询服务、金融保险服务等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另一方面，兼顾效率与规范，加快发展跨境电商、离岸贸易、转口贸易、外贸综合服务等贸易新领域，不断推动服务链条的延伸拓展，做大做强高端贸易生产性服务业，对货物贸易形成更有力支撑。

2.投资方面，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平衡。完善配套政策，发挥各类主体作用，不断提升内外链接作用。一方面，持续巩固高能级总部在国内投资布局的落地首选。把握行业领域取消外资股比限制的机遇，围绕国家和本市战略需求，聚焦高端制造和高能级服务，持续吸引相关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落地集聚，同时，积极鼓励引导已落地总部机构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级，持续放大本地辐射溢出效应。另一方面，着力形成内资企业对外投资的窗口跳板。顺应内资企业特别是长三角优质企业业务整合、开拓国际

市场的发展需求，进一步发挥上海专业服务业基础雄厚、人才丰富的资源优势，支持引导内资企业在沪搭建金融投资、贸易营运等对外窗口平台。围绕风险对冲、政策解读、金融配套等重点领域，完善综合配套监管服务，加强对走出去企业的支持与引导。

（三）做好要素和制度的统筹，推动“两个接轨”

1.推动要素流动、行业准入、限制措施的更高水平开放接轨。要素流动方面，着力提高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水平、货物资源的国际中转率、创新要素的开放共享度和在沪人才的国际化比重。行业准入接轨方面，以临港新片区为试验田，先行先试扩大金融、增值电信、数据跨境流动、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准入。限制措施方面，对标国际高标准，不断优化调整服务贸易限制措施，在充分竞争、有限竞争类重点服务领域和自然垄断类服务领域的竞争环节，推动取消或放宽对服务贸易的限制措施，健全完善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

2.探索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全面接轨。规则方面，聚焦知识产权、竞争规则、政府采购、劳工保护等重点领域，对标CPTPP 等全球高标准协定，循序渐进推进改革试验。围绕研究、交流、协定纠纷等领域，探索建立区域经贸服务体系。规制方面，探索产业政策向竞争政策的切换过渡路径，前瞻研究针对新经济新模式的政府规制方法与模式。管理方面，聚焦服务业重点领域，结合各行业特点和发展实际，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构建新型开放管理制度。标准方面，努力提高在三大国际标准组织中的地位，积极争抢国际标准的话语权，通过与国际标准化团体合作，探索组建本地综合服务机构，提升国内企业注册境外商标、国际认证等事项的便利性。

（四）做好创新和安全的统筹，防范“两个风险”

1.大力发展贸易新模式新业态，注重防范政策风险。一方面，立足开放功能体系补短板，加大各类贸易新模式新业态的试点探索和压力测试，不断提升政策落地便利度，探索建立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税制安排。顺应数字贸易发展趋势，积极开展有利于数据跨境流动的制度创新。另一方面，围绕资金流动、技术研发、数据交换等关键环节，持续优化完善风险识别、监管和评估方式，以海量数据为基础，加快贸易数字化转型，建立涵盖政府部门和企业主体的一体化大数据平台，探索“穿透式”监管，加强政策创新下的配套监管模式创新和风险防控。

2.主动补链、强链，降低产业链供应链断链风险。一方面，立足国家安全，全面梳理产业链断点、薄弱点，依托区域一体化发展优势，强化政策协同激励，大力推动进口替代，合力提升国内产业发展自主化水平。另一方面，推动本土产业链各环节有效衔接，通过建立交易撮合平台、完善国产上下游配套政策等方式，进一步强化长三角地区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枢纽作用，有力支撑国内产业链条循环畅通。